**日本诗史的编撰理念**

《日本诗史》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题名“诗史”的涵义：

“ 是编论诗以及人，非传人以及诗，即巨儒学苟无篇章存在者，亦不论载焉。此所以名诗史之义。”（凡例）

江户时代在日本汉文学史上被称为“儒者文学的时代”（绪方惟精，日本文学史，156；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231）。相对于十八世纪才出现的专门的诗人阶层，儒学者在江户时代之初就有着较为独立的地位。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大儒在京都的积极活动，以及时任将军家康不限制清原氏、中原氏两个明经家门以外的学者对经书进行加点、阐释，一些大儒的讲学遂招徕了许多倾心儒学的人士，到最后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门派。

但《日本诗史》所透露的观念，并非盲随时风追捧大儒，而是以诗为纲目，突出了诗在诗史编撰中的中心地位。而这种书写上的尝试，除了和当时风气有所相对外，还体现了一种将文学和经学进行分离的努力。有学者总结过江户时代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经学和文学处在没有分化的状态，对汉文学的研究亦无法摆脱与经学的纠缠。《日本诗史》显然是逆潮流而行的特例。

这种观念体现在其书写中，则并不绝对因为某位人士诗才不足而不录其名。相反，江村北海采取的策略是，详录某人官职、世系，而后道其诗才不足。如评价平安中期的贵族和公卿：

“文章博士为长，大学头在高。并有水乡春望七绝，俱非佳境。”（16）

17:中纳言

“庆滋保胤也。贺阳丰年也。朝野鹿取也。当时甚有声誉，而遗诗皆不满人意。菅野道真撰《续日本纪》，文才可想而诗殊不谐。”（21）

从这种“声誉-诗才”，甚至“文才-诗才”对立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日本诗史》所具有的，对“诗”这一文体的自觉意识。

而这种自觉意识体现是诗史编撰者的独特眼光。不难看到，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中所做的，并非简单对日本汉诗发展史的回顾，而是去发现，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从以下评价中可以看到《日本诗史》对世间常识的批判：

“内大臣实隆（三条西实隆），号逍遥院。因课子弟誊写六经及《史记》、《汉书》等，世知公为和歌巨擎。而不知有文学。故揭而出之。”（15）

为何江村北海能够揭示常识以外的现象？上文提到，江户时代汉文学的研究和经学密不可分。而在这一时期，汉文历史，尤其是《本朝通鉴》、《大日本史》等正史的编撰也是日本汉文学史家考察的重要对象。这些历史文献的成立需要儒学者具备丰厚的历史学养，来对现有的文本进行整理和批判。此外，除了儒学者，这种以文本批评为核心的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到国学者的学问思考中间。因此可以认为，彼时日本社会中，具有汉文素养的学者对于文献中的历史性知识是有着较为自觉的追求的。

而这种自觉的追求，在《日本诗史》中有较多的例子。如：

“左卫门尉周光，《冬日山家即事》虽有小疵，自是胸臆中语，古平淡中反觉有味。史称周光宦仕不達。……余阅无题诗集。载周光诗多至百首。大抵山题咏，则史言诚是。”（14）

“大伴池主有上已诗。见《万叶集》。大伴氏上有《观渤海》，贡使入朝七言律，见《凌云集》。渤海朝贡始未具见旧史。后辽太祖灭渤海，改为东丹国。以长子倍为东丹王。其地濒北海。明时名哈密者。”（20）

可以看到，《日本诗史》的文献基础，除了历代诗家诗集，还有涵盖人物传记乃至地理等诸方面的历史材料。江村北海对这些材料的使用，除了对诗人生平、诗集作品，乃至诗作中所涉事件与历史作相互印证，证明其真实性外，也体现出当时儒学者综合性的汉文学养。